



那场属于盛唐的相遇

◎赵公友



李邕书“龙兴之寺”(资料图片)。

唐天宝元年(742年),唐朝推行改州为郡的行政改革,青州改称北海郡。

天宝初年,李邕出任北海郡太守,世称“李北海”。

李邕,字泰和,天资聪慧,幼承家学,少年时以擅长辞章而闻名。盛唐时已是名士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其父李善是唐代著名学者,人称“书厨”。

李邕年轻时就有名气,文采好且为人正直,史载李邕“素负美名……人间素有声,后进不识,京洛阡陌聚观,以为古人。或传眉目有异,衣冠望风,寻访门巷”。其文章、书翰、公直、词辨、义烈、英迈皆过人,时称“六绝”。尤长于碑颂,书法初学王羲之、王献之,后自成一格,笔力雄健,气韵浑厚,被誉为“书中仙手”。

今青州有“司空公青州刺史临淮王像碑”,俗称“大齐碑”,碑阴刻李邕书“龙兴之寺”四个大字。

《旧唐书》记载:“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,未有如邕者。”李邕的人格魅力与艺术成就,使其成为盛唐文化史上一位标志性人物。

李邕生性豪爽,为人耿介磊落,不畏权贵。他爱惜英才,时常以家资助孤苦,周济他人。

十分敬仰李邕的李白与李邕在齐鲁相逢,成就了一段轰动文坛的千古佳话。

李白,字太白,号青莲居士,有“诗仙”之美誉。诗风雄奇豪放,想象丰富,语言流转自然,音律和谐多变,善于从民间文艺和神话传说中吸取营养和素材,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,是极具个性特色和浪漫精神的诗人,达到盛唐诗歌艺术的巅峰。据记载,天宝三年(744年),李白在长安受到权贵的排挤,被“赐金放还”,离开朝廷,开始云游四方。

在这之前,两人曾有一场不快之遇。

早在二十多年前,李白年少自负,胸怀大志。漫游渝州时,曾专程登门拜谒时任渝州刺史的李邕,希望得到举荐赏识。

《旧唐书》称李邕“颇自矜”,面对生性狂放不羁、不惧礼法的李白,李邕甚是不屑,并加以斥责。心高气傲的李白心绪难平,当即写下了《上李邕》,诗曰:

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。
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却沧浪水。

世人见我恒殊调,闻余大言皆冷笑。

父兄犹能畏后生,丈夫未可轻年少。

李白借大鹏自喻,自叙天资高远,志向不凡,并借用孔子“后生可畏”的典故,对李邕瞧不起自己的态度表达不满。

时至今日,李白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”的千古名句,焕发出跨越千年的时代生命力,生动诠释出我们奔赴民族复兴之路的昂扬气魄。

时隔二十多年,李邕、李白重逢,一笑泯去曾经的怠慢与不悦,李邕已欣赏李白的才华。他们有时畅谈痛饮,有时到深山道观去“寻仙”。李邕历尽宦海浮沉,李白满怀仕途郁愤,一腔心事尽付席间杯盏,万千愁绪消散于松间青烟。

李白听闻李邕曾上疏朝廷救下一位为夫复仇的女子一事,深受触动,曾挥毫写下《东海有勇妇》:

梁山感杞妻,恸哭为之倾。

金石忽暂开,都由激深情。

东海有勇妇,何惭苏子卿。

学剑越处子,超然若流星。

损躯报夫仇,万死不顾生。

白刃耀素雪,苍天感精诚。

十步两躩跃,三呼一交兵。

斩首掉国门,蹴踏五藏行。

豁此伉俪愤,粲然大义明。

北海李使君,飞章奏天庭。

舍罪警风俗,流芳播沧瀛。

名在烈女籍,竹帛已光荣。

淳于免诏狱,汉主为缙萦。

津妾一搢歌,脱父于严刑。

十子若不肯,不如一女英。

豫让斩空衣,有心竟无成。

要离杀庆忌,壮夫所素轻。

妻子亦何辜,焚之买虚声。

岂如东海妇,事立独扬名。

这首诗句句铿锵,既赞颂了女子舍身复仇的凛然侠气,也褒扬了李邕体恤民情、扶正世风,为官的仁义与胆识。

遥想当年,李邕温文尔雅,李白豪情未减,杯盏交错间,过往的傲慢与偏见,皆消融于这迟来却珍贵的相逢里。

从“丈夫未可轻年少”的傲骨铮铮,到“英风豪气今何在”的深切缅怀,这次重逢,是盛唐气象下两个孤傲灵魂的一次和解。

岁月如风,昔日渝州的不悦,终在此时化为把酒言欢的深情。没有权贵的冷眼,少了少年的轻狂,多了历经沧桑后的彼此懂得与珍惜。李白的豪迈不羁仍在,而对前辈的不悦已逝,初心的笃定,和向李北海表达的敬意,流淌于他的诗句之间。

李白与李邕的相逢,多了诗意氤氲。也因为李白与李邕的相拥,让历史上多了一个承载盛唐气象、侠义精神与文人风骨的文化符号。

相聚的岁月匆匆而过,离别之后却世事难料。

天宝六年(747年),奸相李林甫罗织罪名构陷,李邕惨遭杖杀。李白得知噩耗后悲痛不已,在《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》中写道:“君不见李北海,英风豪气今何在!”绵长哀思隔着岁月山河,道尽对故友的追念与不平。

后来,李白流放途中滞留江夏,凭吊李邕故居,写下《题江夏修静寺》,以“平生种桃李,寂灭不成春”感叹李邕一生提携后生却含冤而逝的悲剧,表达了对故人的无限惋惜与敬仰。

北海风清,李白与李邕的往事,让这片沃土滋生出月光般绵长的浪漫。这一场流光溢彩的盛唐名士的相逢,把文人风骨、侠义仁心、知己情谊,融进了这片土地的一草一木。岁月的注脚里,大鹏展翅的豪情,北海名士的气节,伴随着千年诗文的流淌,酿就的不仅是文学的瑰宝,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永不熄灭的灯火。

文物会说话

“淘井”记

◎崔斌

华夏乡土的烟火文脉,从来都与一口口古井紧紧相依。自古村落依井而建,人烟随井而聚,井水不息,民生便不绝。正因井是故土根基的印记,古人才将漂泊异乡,辞别家园称作“背井离乡”。

早期先民掘土为井,构木固壁,工艺简单难抵水土侵蚀。春秋战国时期,陶圈井应运而生,成为古代造井技术的一次重要革新。这种以预制圆筒形陶圈逐节套叠、层层垒筑的水井形制,规避了土井易塌、木井易腐的弊端,工艺规整、实用性强,自春秋战国至汉代,广泛应用于各城邑聚落,成为城市核心生活设施。

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出土的陶井圈,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陶圈井遗存。

汉承先秦造井技艺,又将其推向极致。

高密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汉代陶井圈,形制规整匀称,高62厘米,口径88厘米,底径80厘米,整体呈圆筒状,中段微束腰,线条沉稳温润,比例恰到好处。器物装饰层次分明,规制严谨,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。口沿外折下收,上饰“家常富贵”框格式四字篆体铭文一周,字形端庄古朴;外沿唇壁以圆窝纹间隔三角方格纹;腰肩位置排布八字铭文“常饮食百口宜孙子”,字体介于篆隶之间,结字古朴自然,尽显汉代书法的质朴气韵。铭文纹饰下方,均匀分布二十六道平行凸起弦纹,简洁大气;器身中心对称开凿两眼水孔,是适配取水灌溉的核心实用设计。

此件陶井圈为优质白陶质地,胎土细腻纯净,烧制均匀,器形端正无偏差,接缝规整无瑕疵,充分印证了汉代成熟且精湛的制陶工艺。纵观全国考古发掘成果,各地出土的汉代陶井圈大多残缺破损,纹饰模糊,完整器形实属凤毛麟角。高密的这件陶井圈历经两千年埋藏,形制、纹饰、铭文完好如初,是同类遗存中极为罕见的完整标本。

古物出世,向来藏着机缘。高密汉代陶井圈的现世,便是一场乡野间的不期而遇。

1983年,在高密大牟家镇大孙家村以南的田野中,村民平整土地时无意间掘出了这件古物。当地文化馆随即对此处进行勘探发掘,除了这件陶井圈,未发现任何伴随器物,更显其独特珍稀。后来,该器物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。

而清代金石考据的重要发现,为这件陶井圈增添了珍贵的文脉佐证。

清同治年间,潍县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觅得古陶残片,残片留存两种珍贵铭文,恰



汉代陶井圈(资料图片)。



陶井圈的外沿唇壁(资料图片)。



陶井圈腰部铭文(资料图片)。

与高密陶井圈的文字完全吻合,即“家常富贵”与“常饮食百口宜孙子”。

得此陶片,陈介祺欣喜不已,深知其文史价值,不仅多次与友人书信研讨、寄送拓片,更专门著文考据,最初将其判定为陶釜口沿与腹部残片。陈介祺离世后,这批珍贵陶片由潍县藏家高鸿裁收藏,诸多拓本传世至今,为后世考古研究留下了重要文字资料。经后世比对考据,这批残陶的文字、纹饰、形制规制,均与高密出土的完整陶井圈高度契合,学界推测二者大概率出自同源。

散落南北的陶井圈遗存,串联起汉代城邑的繁华盛景。

湖北纪南城遗址曾出土多节完整陶井圈。经过勘探,纪南城内外及周边已发现水井数量超过500口。此外,纪南城四周还

分布着大量楚墓,有封土的墓葬数量在600座左右,无封土墓葬更是不计其数。

水井是人居聚集的直接佐证,人口密度与水井数量呈正向关联。楚文化学者依据纪南城密集的水井群落,规模化墓葬遗址推算,楚郢都纪南城常住人口可达二三十万,已是繁华大城的程度。

相较于普通土井、砖石井,陶圈井建造工艺复杂,制陶成本高,绝非寻常乡野民居所能营建,多集中分布于都城、郡县等。梳理全国陶井圈出土脉络可发现,这类遗存或出自乡民偶然劳作,或源于专家系统考古,或藏于乡野静待发掘,每一次现世,都在丰富考古馆藏,完善古建研究体系、填补区域文脉空白。

高密陶井圈与陈介祺旧藏残陶的同源印证,更厘清了汉代潍河中游的行政与文

化脉络。

两汉时期,潍河中下游水土丰饶,交通便利,土族聚居,是齐鲁大地繁华富庶的区域。经济繁荣、民生安定、手工业发达,才有余力精工细作、雕琢带铭文的制式井圈,这也是高密精美汉代陶井圈得以诞生的时代根基。

透过器物表象我们可以看到,陶圈井承载的是古人超前的工程智慧。其独创的“沉井法”建造工艺,是先秦至汉代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,原理科学、构思精妙,与现代桥梁、铁路基础施工的沉井技术高度相通。其施工流程严谨有序:先开挖直径略大于陶井圈的土井,挖至浅层水土层,置入首节陶圈;通过圈内挖土,借助陶圈自重自然下沉,逐节叠加新的陶圈,层层衔接,持续深挖,直至抵达稳定含水层;部分井圈预留二至四个穿

绳孔,便于施工固定、精准对位,保障井体稳固垂直。

随着文化传播融合,秦汉时期陶圈井制作技术逐步向岭南地区扩散,覆盖范围持续扩大。陶井圈还衍生出礼仪功能,成为陪葬明器,寓意故土安稳、活水绵延,寄托了古人生死相依、安守家园的朴素期望。

全国多地重大考古遗址出土的陶圈井遗存,完整勾勒出汉代造井工艺的标准体系与规模制式。

高密出土的完整井圈,是整座古井的单个构件,方寸之间,可见整井规制的宏大。

各地古井纹饰各有特色,北方多质朴纹样,南方多简约纹样。北京龙爪槐遗址发现的汉代陶井圈外饰席纹、内饰漩涡纹;河北燕下都遗址出土的战国陶井圈,器身饰直绳纹。

相较各地遗存,高密汉代陶井圈集篆隶铭文、圆窝纹、三角方格纹、多层弦纹于一体,纹饰层次丰富、人文寓意浓厚,在全国同类器物中尤为珍贵。

从实用维度审视,陶圈井的工艺优势,体现了古人适配自然、优化民生的思想。传统砖石垒砌井壁,不仅耗材费力,工期漫长,且结构松散,极易坍塌淤积,污水、泥沙易渗入井中,污染水源,影响饮用。而标准化烧制的陶圈井,逐节咬合、无缝衔接,整体性极强。井壁能够均匀分散土层侧压力,抗压稳固、不易坍塌;槽口式唇沿设计,让上下井圈精准对位、无缝拼接,保障井体垂直规整,杜绝泥沙杂物渗入。

器身中部的双眼水孔,更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生存智慧,设计极简却更加科学。汛期水脉充盈,地下水通过小孔缓缓渗入井内,蓄积充足活水;旱季,双孔口径狭小,能有效锁住井水,减少渗漏,最大限度保障人畜日常饮水需求。一渗一蓄之间,平衡天时旱涝,透露出先民因地制宜、顺势而为的生存哲学。

一口古井,一截陶圈,看似寻常造物,实则承载着一个时代的记忆。高密汉代陶井圈这精工制式的器物,诞生于两汉潍河中下游的繁华沃土。“家常富贵”是对生活富足的期许,“常饮食百口宜孙子”是对家族绵延的祈愿,质朴铭文、规整纹饰、科学工艺,将民间愿景与造物智慧融为一体。

岁月流转,古井已退出现代生活,但这些曾被深埋又重见天日的陶井圈,从未失去价值。它们是活着的史料,以具象的器物、精准的规制、鲜活的纹饰,佐证着先民的智慧,沉淀着古人顺应自然、精工造物、务实求真精神。